普希金好像是为少年写作的，托尔斯泰是为青年写作的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为中年人以及中年以后的人写作的

刘文飞：今天，我们怎样读俄罗斯文学？

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

近日，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资深教授刘文飞新作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，他以散文式笔法，通俗解读作家的人生、思想与文学创作。刘文飞教授深耕俄苏文学译介近四十年，见证了中俄两国人文交流的历史变迁，被评为中俄人文交流十大杰出人物，是俄罗斯“友谊勋章”获得者。

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、“中俄教育年”启动元年，近日，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刘文飞——



2015年，刘文飞（右）获颁俄罗斯“友谊勋章”

求学之路的两次偶然

羊城晚报：您1977年高考填报的志愿是新闻，后被调剂到安徽师大俄语专业，入学时连一个俄语字母都不认识，后来却把俄罗斯文学当成终身志业，为什么？

刘文飞：当时没有“调剂”这个概念，只要能上大学，大家都欢欣鼓舞。我们班20个同学，只有3人之前在中学时学过俄语，大部分人都是一个俄语字母都不认识。我当时想学新闻，外语和新闻一样，其实都是对外交往。外语系大一、大二有很多关于语音、语法的课程，我感觉有些枯燥。如果这背后没有强大的俄语文学，我可能会换专业。

那时的年轻人都是文学青年，任何一所大学的文学名著都要排队借，读一星期必须归还。还记得我读本科时，借来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高尔基中短篇小说选》，我从教室搬了把椅子坐在教学楼前的棕榈树下，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了。还有一次是读竖排版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我在宿舍楼下的足球场草坪上，从下午读到晚上，晚饭都没顾得上吃。这两个场景，现在就像电影一样浮现在我脑海里，是俄语文学让我在俄语这条跑道上跑了下来。

羊城晚报：您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，最初确定的研究方向是高尔基，导师是张羽先生，后转到李辉凡先生门下。是什么契机奠定了您后来的学术研究方向？

刘文飞：本科进入俄语系是第一个偶然，研究生专业是第二个偶然。当时我想报考社科院新闻所的国际体育新闻专业，结果到我考试那年，这个专业没了。我就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招生目录上看，还有什么专业招俄语，改填志愿到外文所。准考证上写的是报考俄苏文学专业，研究方向是高尔基研究。张羽老师是研究高尔基的专家，也是研究室主任，本来只准备招一个人，后来扩招了一位，李辉凡老师是副主任，也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后来我就跟着李辉凡老师做研究。

羊城晚报：您于1989-1990年在莫斯科普希金语言学院进修，恰逢苏联解体前夕，也是中苏文化交流复苏的关键时期。您到莫斯科实地学习生活，和在国内研究学习苏俄文学，感受有什么不同？

刘文飞：1989年去到莫斯科，我以为看到的是全新的苏联，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陈旧、濒临解体的苏联了，反差非常大。这段时间我在莫斯科去参观了很多和作家相关的名胜，也接触了很多俄罗斯人。在普希金语言学院，有一位打扫卫生的老太太，我有时和她聊聊天。有一次她说：“你说俄语特别有文化。”我心里特高兴，以为是夸奖。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，她的意思其实是，我说的话和他们日常用语不一样。我是通过文学来学习俄语，可能情不自禁会用普希金、屠格涅夫的语言来表达，使用的是“过时”的语言，或者说是很“雅”的俄语。

有时走在莫斯科街上，尤其是老城区，我会感受到这就是列夫·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写到的地方，路人就是俄国文学中那些主人公们的后代。十年后我第二次去做访问学者时，住的地方只和托尔斯泰故居隔一条马路，从窗户可以看到故居的树冠，《复活》就是他在那里写的，我也写了一篇散文《在莫斯科和托尔斯泰做邻居》。

翻译诗歌，AI不如人

羊城晚报：您从本科时开始尝试翻译，深耕普希金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布罗茨基等名家译介近四十年。如今AI技术飞速发展，您认为这对文学翻译有怎样的影响？

刘文飞：当年上语音课、语法课，我觉得枯燥，就开始翻译课本，课本上也有普希金的诗，我把每一句俄语都译成中文。大三的翻译课是我最喜欢的，老师选了很多名著段落，每次我的作业都被当作“范译”给大家朗读，当时我们的翻译工具就只有一本字典。

1990年代我开始正式翻译，为了一个词，可能要花一星期，你明知字典的意思不确切，但又没有更好的途径去查找，最后可能只能求助老师、朋友和俄国人。现在AI能给出很多参考，从这个意义来说，这是对翻译更友好的时代。

AI翻译是先寻找共性，但文学翻译是个性化的，文学存在的前提是语言的个性。我认为，如果说翻译最后被AI取代了，那最后被取代的也一定是文学翻译，是诗歌翻译。我在翻译布罗茨基诗歌时，有人让我试试用AI来翻，试了几次，效果还是不如自己来。年轻人和我说，要不断“投喂”和训练AI，但这也说明AI翻译诗歌是永远走在我的后面的。

羊城晚报：您在新书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》分享会上说，中国当下的文学读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学读者。为什么这样说？

刘文飞：首先，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重视外国文学。无论美国还是俄罗斯，走进他们的书店，你看不到这么大的外国文学专区，但在中国的书店，外国文学占据半壁江山。五四运动之后，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中断了，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吸收外国文学之后发展而来的，中国人的文学视野非常开放。其次，中国的文学读者非常清醒，有自己的文学判断。第三，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力量非常强大，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。举个简单例子，无论是今年刚获诺奖的安妮·卡森，还是2025年获奖的匈牙利作家拉斯洛·克拉斯诺霍尔卡伊，他们都还比较“小众”，但是我们在此之前却都已经有了翻译，可以说我们现在对当代外国作家的译介是一网打尽的。1987年，布罗茨基获诺奖时，中国还没把他翻译过来，这放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契合当下

羊城晚报：近几年国内有一股“陀思妥耶夫斯基热”，《罪与罚》《地下室手记》成为年轻读者的热门读物，很多年轻人会摘抄书中的金句来对照自身的精神困境。您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能击中今天年轻人的心？

刘文飞：实际上他不仅在中国、俄罗斯，在西方也很热门，尽管除了在俄罗斯，就只有中国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。从俄国文学来看，普希金好像是为少年写作的，托尔斯泰是为青年写作的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为中年人以及中年以后的人写作的。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，就像是步入了中年，大家的精神状态都比较疲惫，比较清醒。技术飞速进步，人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似乎更契合当下，有一种充满现代感的观照。今年上海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做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展览，开展一个多月就有40万人参观，而圣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，一年的参观者也未必能有这么多。

羊城晚报：近几年，俄语文学经典改编的舞台剧在中国很受欢迎，包括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舞台剧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，几次中国巡演都很火，还有改编自《战争与和平》的音乐剧《娜塔莎、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》，刚结束巡演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俄语原版音乐剧，以及即将演出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俄语原版话剧，正在巡演的布图索夫导演，俄罗斯国立萨蒂利空剧院的《海鸥》等等，您怎么看这类改编作品？

刘文飞：这里面有不少项目我还深度参与过，比如前段时间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音乐剧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脚本就是我翻译的。文学是俄国艺术界的老大，可以说是文学中心主义，无论是绘画、音乐、舞蹈、话剧，很多都从文学经典中获取灵感。

羊城晚报：除了从舞台剧走近经典名著，您怎么看当下年轻人对经典作品的“碎片化阅读”？

刘文飞：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阅读方式，碎片化阅读和沉浸式阅读，结果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你都能知道书里讲什么。但这两种阅读方式，对大脑的训练是不一样的。比如你一个一个字读完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和你在网络上一分钟速读完《战争与和平》的梗概，你的脑细胞发生的变化，你的阅读所达到的思维训练效果，肯定不同。如果说只有碎片阅读，而没有连续的沉浸式阅读，可能慢慢地也会丧失阅读的能力，丧失思维的能力。

她忘记了全世界，却没忘记自己是记者

□谢红

她今年92岁。失聪，失智。阿尔茨海默症，把她生命里的人和事，一点一点地擦掉了。她忘了女儿的名字，忘了回家的路——唯独没有忘记一件事：她是一名记者。

她叫刘婉玲。羊城晚报1980年复刊时的28名元老之一。全国首批优秀新闻工作者、全国三八红旗手、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，广东省报界第一位女高级记者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初入报社时，她已是“神”一样的人物。我们这些晚辈，只敢远远望着：望见她风风火火，行色匆匆；手里不是攥着采访本，就是背着绿书包；低着头，步履不停，穿得很简朴。那副瘦小的身躯里，好像永远装着下一篇稿子……

1980年，《捆住手脚的院长真难当》——她为复职后“有职无权”的知识分子的呐喊，轰动全国。1983年9月，她又写下《林孔湘立遗书，舍命治“黄龙”》——一位柑橘专家，胃癌晚期，瞒着夫人立下遗书，奔赴广西，只为扑灭柑橘黄龙病。报道一出，再引轰动。1985年，“星期六工程师”系列报道，更是开全国先河。这组报道，是一场“蹲”出来的采访。当时她留意到：一些兼职的工程师，用常规技术，救活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；一个好主意，让乡镇企业的产品迅速升值。凭着新闻人的敏感，她断定：这是一个重大题材。可这些工程师，刻意低调。于是，在广州通往顺德、南海、中山的必经之地——龙江渡口，连续几个傍晚，她守在渡船上，见到知识分子模样的人，就主动上前攀谈打听，而为了保护他们，报道里，绝不提他们的名字。一个个鲜活的故事，就是这样“蹲”回来的。

她还为一个卖猪肉的青年宗永强写过报道。这个生计拮据的个体户，工余时间自学海洋学、翻译英文著作。刘婉玲的文章，改变了宗永强的一生：破格进入广东省科学院，后赴英读博，成为香港大学教授。2016年，宗永强专程回来看她，只为当面说一声谢谢。

她自己说：“一篇报道像一支手枪，只打一个点；系列报道像机关枪，一扫一大片。我更喜欢机关枪。”

她还叮嘱年轻人：“下去采访一定要仔细，哪怕是草，也要抓一把回来。这次用不上，下次用得上。”

拨乱反正、改革开放的初期，她是那个时代最活跃的记录者，是知识分子的代言人——她的报道推动着时代，时代也记住了她。

很多人以为，事业心这么强的刘婉玲，在家一定是“甩手掌柜”。恰恰相反——家里大事小事，她全包揽：换灯泡、修水管、通马桶、扛煤气瓶、做饭……都是她一个人做。做事执着、简单、干净利落，颇有男子气概。

女儿身体不好，她带着女儿访遍全国名医，一本病历，做得比医生还详尽。丈夫重病五年，她守在床边五年，一个行李箱常年备好，发病，即刻冲去医院。做菜做到太累，站着都能睡着。

对工作有多深情，对家人就有多深情。她这一辈子，做什么都是——全身心。

这份言传身教，也影响了女儿。她的女儿陈冬青后来成了羊城晚报的高级记者，和我同一个办公室多年。在她身上，我常常看到她妈妈的影子。她说，自己这一生也遇到过不少困难，但妈妈就是她最大的底气，是人生路上永远的榜样。

那天，我捧着鲜花和水果去看她。她耳朵听不见；说过的话，随即就忘。女儿和她说话，靠写字。

女儿写下：“她是我的同事。”

她看懂了，抬起头问我：“你也是记者？羊城晚报的？那你喜不喜欢当记者？”

我说：“非常喜欢。”

女儿又把问题写给她。她看了，几乎不假思索：“嗯嗯，当记者谁不喜欢啊？谁都喜欢当记者。现在让我去做，我也要去做。”

女儿写下：“她后来去了佛山记者站。”

她一看，脱口而出：“佛山的新闻很多啊！但是佛山的新闻，也不好做。”

在养老社区，她什么都记不住了，却还记着自己是一名记者，每天去取报纸，是“外出采访”；住的房间，是“编辑室”；身边的护理员，是“老同事”；她每天伏案写字，说要“交稿”；耳朵听不见，就握着笔，一句一句写下来。

她听不见这个世界的声音，这个世界也快要听不见她的声音了。可一提起新闻，她的眼睛就亮了，话也密了—— 还是当年的语气，还是记者的语气。

离开前，我请她写几个字。她握笔，认真得像在签一生的稿约，一笔一画，写下：“羊城晚报 记者 刘婉玲”。她什么都忘了，唯独这九个字，一笔都没有忘记。

阿尔茨海默症可以夺走她的记忆，却夺不走她刻在生命里的热爱。

一个人忘记了全世界，却没有忘记自己是谁。因为她写过的每一篇报道，帮助过的每一个人，早已长进了她的骨血里，任什么病痛，都剥不走了。

记者，是她一生的职业，更是她92岁的今天依然握在手里、不肯放下的那支笔。

刘婉玲，92岁，记者。

她用笔改写了别人的命运；而当命运收走她的一切时，唯独留下了“记者”这两个字。



好事连连（中国画）
张铁威

“我与中国”APEC主题征文

月湖风雅

□刘贵高[越南]

但凡江河流经之地，必定是人杰地灵。比如宁波，三江交汇，依水而城，而水的灵气非月湖莫属。

月湖位于宁波市老城区西南，由于湖面呈月牙形，故称为月湖。据史料记载，月湖开凿于唐贞观年间，当时宁波县令带领当地民众兴修水利，“导他山之水，作堰江溪”，并引流入城，为日、月两湖。

到了宋代，宁波成为繁华的都市和商业重镇，城中水利相继修竣。南宋绍兴年间，官府在湖畔广筑亭台楼阁，遍植四时花树，形成“月湖十洲”胜景。这十洲分别是：竹屿、花屿、烟屿、雪汀、月岛、竹洲、柳汀、菊花洲、芳草洲、芙蓉洲，此外，湖中还有三堤七桥交相辉映，构成了景色秀丽、如诗如画般的风光。

一湖风雅，文韵悠然。千年沉浮，百年积淀，如烟往事在湖水与青瓦间缓缓流淌。贺知章、王安石、杨简等，或隐居、或讲学、或为官、或著述，都在月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月湖银杏林，又名院士林，由118株银杏树组成，每一株都对应一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。当凉意渐起，秋水潺湲，月湖公园的底色便不再单调。风过处，金灿灿的叶片纷扬飘落，恍若“黄金碎屑人间雨”——这漫天飞舞的银杏，仿佛藏着一整座城的秘语。

银杏树作为第四纪冰川的孑遗植物，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。秋天的宁波，不只是在月湖公园能够看到银杏，在偃月街、中山公园、天童寺、东吴镇、茅镬村、毛岙银杏古村、东钱湖银杏大道，都能见到流金溢彩美不胜收的银杏美景。

植物有春荣秋枯，也常与自然合鸣，那是生活的天籁，也是日日相伴的美好。捕一段流光细嗅风月，剪一段身影留予闲情。透过纷纷扬扬的黄叶，曾经的歌台舞榭有衣香鬓影，酒肆勾栏中有缠绵南戏，商贾名士云集于此谈笑风生。静寂幽深之处，佛教居士林、高丽使馆遗址、银台第官宅博物馆……漫溢着城市高雅的文化特质。

月湖西岸，明兵部右侍郎范钦建造的“天一生水，地成六之”的天一阁，这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傲然屹立四百余年，洗炼出历史文化名城“书藏古今”的底蕴。

聆听过花开的轻响，细数过雨水的纹路。月湖，一如她的名字，散发着空灵、别致、秀气、古朴的气息。从古至今，江南的美景，月湖的雅致，给了无数文人墨客想象的空间。

宁波，这座历史文化名城，已稳稳走过了八千载风雨岁月。八千年来，从井头山文明的一支木桨到东方大港的巨锚，从天一阁朗朗的书声到闯荡天下的宁波帮，滨海而居的宁波人栉风沐雨，至今仍薪火相传，弦歌不辍。

“秋风响，蟹脚痒”

□王晖

秋天，真是个美妙的季节。在江淮地区，这个季节极短，却天空澄净，气温宜人，金桂飘香，果蔬丰盛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“秋风响，蟹脚痒”，黄满膏肥的螃蟹也适时上市了。

再忙也不能不吃螃蟹，此种心态，从位于菜市水产区蟹铺前的人头攒动，不难窥探到几分。今年“双节”期间，趁着休闲在家，时间充裕，连吃了几次螃蟹。每天傍晚，先将买来的新姜刮皮，剁成细末，盛在碗中，倒入镇江香醋浸泡，并掺加少许绵白糖，拌匀。再把洗净的蟹，取白棉绳捆好，放到屉上，蒸熟。揭开锅盖，自热雾蒸腾的屉上抓出一匹壮硕的尖脐，趁热掰下两只毛茸茸的大螯，小心翼翼地咬开，掏出里面的充盈嫩玉，将两根连着脆薄硬骨的螃蟹活动钳的绒毛拼粘在一起，一只黑白分明的“蟹蝴蝶”便诞生了。

年少时，家里食蟹，我和妹妹总抢着将长辈们丢置在桌上的蟹钳做成“蟹蝴蝶”，粘贴在墙上或窗玻璃上。“蟹蝴蝶”会在那里栖伏很长时日，以至颜色变得黄旧了，仍不会脱落。当日童稚，如今已年过半百，虽不失童趣地依旧完结了这道食蟹仪式，却再不会淘气地拿着“蟹蝴蝶”，向家里的墙面、窗上乱贴了。于是，把“蟹蝴蝶”放在桌上欣赏。然后，细心剔剥整蟹，将挑出的肉、黄、膏，浸入醋泡姜末蘸食，细细咀嚼，真是滋味悠长啊。

每餐，我惯食一尖一团两只螃蟹。蟹属寒性，不可多食。但尖、团同吃，除可尝食细嫩的蟹肉，还能品味到雌蟹的鲜香脂黄，同时享受雄蟹的粘腴膏白，堪称美美与共。食后，用蟹铺老板附赠的芫荽，加凉茶水洗手，腥气尽去。这时，煮上一锅手擀面条，取预先备好的新鲜黄牛肉丝和红椒丝爆炒，撒上一些白胡椒粉，家里每人盛上一碗面条，以爆炒双丝作浇头，盖在面上，热气腾腾地吃下，额头沁出了晶晶汗珠，让人无法不沉浸乃至陶醉。

好日子总嫌过得太快，一晃，便秋去冬来了。当务之急，是抓紧时间多剥食几只螃蟹，不要辜负这个季节。